

MINGQING NINGBO WENXUEJIA PINGZHUAN

明清宁波文学家评传

张如安 张 萍 著



海洋出版社

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课题成果

宁波市文化服务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课题成果

明清宁波文学家评传

张如安 张萍 著

海洋出版社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宁波文学家评传/张如安, 张萍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27 - 7970 - 2

I. ①明…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作家—评传—宁波市—明清时
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986 号

责任编辑: 陈莎莎

责任印制: 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54 千字 定价: 46.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本书所称的“宁波”，是按现今的行政区划而言的。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宁波文学的繁荣时期，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众多，作品繁富。即以明代而论，有学者据《明诗纪事》所载统计，以府言，宁波府诗人计 87 家，排名为全国第 11 位，浙江省第 2 位（仅次于嘉兴府）；以县言，鄞县诗人计 71 家，排名全国第 6 位，浙江省第 1 位，而历来文化发达的山阴却只有 33 家，排名全国第 16 位，浙江第 4 位，^① 远远落在鄞县后面。这一数字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明代宁波作家较强的创作阵容和实绩。而实际上明代宁波作家远不止此。笔者据几部同治、光绪、民国间修县志《艺文志》的明代部分略作统计，宁波诸县，奉化 70 余家别集不下 90 部；象山 20 余家别集近 30 部；慈溪 200 余家别集约 330 部；镇海 50 余家别集约 120 部；宁海 30 余家别集约 40 部；余姚 90 余家别集约 160 部；最为亮丽的是鄞县，有诗文集多达 760 余部。可以说，在明代宁波的各种类型的人才中，文学人才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为此，李堂在《与王阳明书》中就不胜赞叹：“皇明文献何独盛于乡邦哉！”^② 至于清代，仅《四明清诗略》及其《续略》就收录有清一代宁波五县之诗计 2194 家 9468 首，若加上余姚、宁海两县，则清代四明诗人的数量更夥。其次表现为不乏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诗文作家如方孝孺、王守仁、沈明臣、屠隆、张煌言、沈光文、黄宗羲、周容、全祖望、姚燮等，戏曲作家如屠隆、周朝俊、叶宪祖、吕天成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明清宁波文学业绩不凡，学术界对宁波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

① 周明初：《明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相关问题》，见朱万曙、徐道彬编：《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第 280—282 页。

② 【明】李堂：《墓山集》卷 8。

实绩。除了大量的论文外，洪克夷《姚燮评传》、吴新苗《屠隆研究》、吴书荫《曲品校注》、华建新《王阳明诗歌研究》、王孙荣《孙月峰年谱》等，都是优秀的著作成果。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明清宁波文学家的研究和介绍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清代作家，研究者更少。因此除了少数的大家、名家之外，大量的有影响的宁波作家沉埋至今，不为人所知。为此，我们选取了明清各个时期的12位宁波籍文学家，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生平和成就做了必要的评述。选录的作家中，既有方孝孺、全祖望这样的名家，更多的作家是少有人甚或从未有人评述过的。王守仁、屠隆、黄宗羲、姚燮等作家我们都没有选录，不是因为他们不够重要，而是因为相关的研究资料较多，读者容易获得。为了追求更多的原创性，我们想尽量拓宽评述的范围，于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其他少有人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身上。通过评述，我们得出不少新鲜的结论。如经过考订，指出黄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关于鉴湖诗社社集形式的记载是错误的，即为一例。我们以评传的形式，尽可能地使这部著作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工作，能够对明清宁波文学的成就有更深的认识，并为未来编纂大型的《宁波文学史》，提供前驱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评述中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如安



目次

郑真评传	(1)
一、郑真的生平与学术	(1)
二、清俊雅音的诗歌	(4)
三、观物察理的散文	(13)
方孝孺评传	(18)
一、方孝孺的生平和学行	(18)
二、别有识见的文论	(20)
三、纵横豪放的散文	(30)
四、富有骨气的诗歌	(37)
张楷评传	(49)
一、从监察官员到平叛监军	(49)
二、和韵诗：严重因袭中有所突围	(53)
三、《浦东崔张珠玉诗》的特殊意义	(59)
陈束评传	(64)
一、陈束的生平大略	(64)
二、“嘉靖八才子”的形成与解体	(66)
三、陈束的诗歌创作	(72)
四、陈束的散文创作	(78)
张时彻评传	(83)
一、生平跌宕著述丰	(83)
二、乐府六绝多可观	(87)
三、综撷绌出散文	(90)
四、《说林》之文尤隽异	(95)
屠本峻评传	(102)
一、生平风流著述多	(102)
二、情采、声韵兼备说与诗歌创作	(105)
三、令人谐谑的小品创作	(112)
四、缘情寄曲，风流纵诞	(122)

叶宪祖评传	(125)
一、驱车九折,浩浩落落	(125)
二、公之至处,自在填词	(128)
三、赞女子再嫁,真情至上	(133)
四、写豪杰才士,意在刺世	(137)
五、喜信物绾合,团圆作结	(142)
吕天成评传	(148)
一、其于词学,故有渊源	(148)
二、舞象即嗜曲,弱冠好填词	(151)
三、“得罪名教”的文学创作	(154)
四、举今昔传奇而甲乙的《曲品》	(157)
五、新的品曲标准对传统戏曲批评观念的突破	(159)
李邺嗣评传	(167)
一、侧身忧患,九死不死	(167)
二、举梨洲之言以警励学者	(177)
三、浙东诗坛一巨子	(182)
四、斯文之统,自在浙东	(186)
周斯盛评传	(192)
一、周斯盛的生平大略	(192)
二、幽眇放恣证山诗	(195)
三、羁怀萧索证山词	(200)
裘琏评传	(204)
一、遗孤·进士·囚徒	(204)
二、等身卷帙,极才人之致	(207)
三、《四韵事》杂剧:名为“自娱”,实为自伤	(210)
四、《女昆仑》传奇与《万寿升平乐府》杂剧	(214)
五、戏曲创作:清初汉族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缩影	(218)
全祖望评传	(222)
一、全祖望的生平和学术	(222)
二、作诗聊足补献征	(228)
三、志士雄文重两朝	(231)
后记	(238)



郑真评传

郑真（1332年—？），字千之，自号荥阳外史。先世宋时由吴兴迁鄞，其子孙故居于今宁波市海曙区，称“求我斋郑氏”。郑真是明初浙东派文学较为重要的一家。

✱一、郑真的生平与学术

郑真祖父郑芳叔，遍游宋遗老之门，搜辑故事，日录记闻，尤笃于伦理。曾两任鄞县训导，著有《蒙隐集》。父亲郑觉民，积学笃行，“自经史、传记、诸子，以及天文、地理、历算、兵刑、食货、医卜、释老之书，罔不悉究。”^① 曾为郡守王元恭酌定乡饮酒礼的礼仪。后讲道慈溪龙山，以知行体用训学者。以荐授龙游教谕，后授处州教授，著有《求我斋集》，戴良所作序，特别强调其“文献之所传”。郑真为觉民的次子，少承家学。元代大儒吴澄曾发策十二事，能够应对者十不得一。郑真年少气盛，全部应答下来，一时声名鹊起。

郑真自青年时代就抱有高远的志向。他说：“士之生非专为食也，立身行己，可效可师，致位庙堂，丞疑辅弼，丰功盛德，泽斯民而传后世，其斯可矣。”^② 他自称自己在“弱冠时，用意两制学，唐宋诸名家赞书，多能成诵。及闾乡先生内翰厚斋王公《词学指南》及《掖垣》、《玉堂类稿》，益能深究制作之体。”^③ 这段文字很值得注意。他所提到的“两制”，指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

① 【元】戴良：《九灵山房记》卷21《求我斋文集序》。

②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11《田园隐记》。

③ 【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57《拟加封梓潼帝君制》。



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王应麟的《词学指南》卷二至卷四，专门研究词科十二体之“体式”，其中就有“制”体。至于《掖垣类稿》、《玉堂类稿》，分别由王应麟值守学士院期间所起草内制、任职中书省时期起草外制的汇辑。臣下作制是代皇帝立言，这对于封建文人来说是最为荣耀之事，这就难怪郑真要留心学习，不断拟作了，至今其文集《荜阳外史集》中还保留了大量拟作的制表。郑真说：“予生也晚，窃好论著前朝典故及乡里人物，且于两制之学尤致志焉。”^①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荣登玉堂，以词臣身份草拟制文，因此他对于“制作之体”的悉心揣摩，正“以见其志之所存”。^②他读书郡庠，认真学习《春秋》，选择以《春秋》一经应试，曾“私拟数十题以应场屋一日之敌”，但最后都劳而无功。郑真后来回忆，认为在元时因“学不得硕师，徒守传注，杂以讹言臆说，虽穷日夜、敝精神，卒不得旨意所在，故战艺载北，心志不通，名闻不彰，无有振而作之者”。^③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郑真在定海凤湖方氏家授徒，开始学写古人文章，所作《拟进平益都颂》得到父亲的指授。

明朝建立，郑真继续着他的科举之梦，终于在洪武四年（1371年）中举。六年（1373年），授安徽临淮县教谕，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甚至自称为“风雨淮山旧谪仙”。^④七年（1374年）七月，郑真奉中京太守之命，至泗州虹县王庄驿盘量官贮米菽，有《出使录》纪其行程和吟咏。十一年（1378年）二月初，晋王朱栢路过临淮时，召他讲解《春秋》大义，并受命撰《晋王之国谢表》，深得赏识，称他为郑先生。十七年（1384年），任满，进京入见，先后参加朝会54次，赐酒食11次，又命赋“朝期赐宴”及续“菊绽西风”、“露脂枫叶”等诗，颇得朱元璋欣赏，遂升任江西广信府教授。郑真与兄郑驹、弟郑凤并以文学擅名。郑真所著有《荜阳外史集》100卷。

郑真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还是明初浙东心、理学两派合流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心与天地同体，他说：“人与天地参者也，天地之

①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91《贻史文可》。

②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57《拟加封梓潼帝君制》。

③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54《胡子奇哀挽辞》。

④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91《答颍上训导朱明仲先生》。

心，即吾之心；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亦一太极也；天地无有限量，吾心亦无有限量也。囿乎方寸之中，而极乎六合之内，静而与乾坤同其体也，动而与乾坤同其用也。”^① 他认为心是看不见而又无处不能贯通的物质形态，“心之在人，谓之有物，则不可以形像求之，谓之无物，则其日用常行亦无非心之所为而已”。^② 郑真又进而主张心理合一、心物相通，他说：“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会一心。故即诸物者即诸理可也，即诸理者即诸心可也。心即理，理即心，通乎理之一者，由其心之一也。”这样，“自吾身而推之家国天下事，至物来皆一以贯之，而无碍于其间矣。”^③ 如此，郑真之心所蕴结的已非物之固有规律，而是义理之心，此理也就是“仁”、“德”，只要“心与理融，意与身会，四方上下，皆吾一举目一举足之间，是非取舍，惟义是从，不以贫贱富贵而移也，死生祸福而变也。”^④ 很显然，郑真的心学思想也糅合了朱学派的观点。郑真认为“理存乎心”，而心之本质“冲然而虚，而无有蔽塞也；洁然其白，而无有污浊也。”但是后天的“声色气味之交，耳目口鼻之欲”容易使“虚者塞，白者涅矣”，从而使本然之天斲丧殆尽。所以郑真提出要以圣人的“诚敬之要，存养之功”，以“遏人欲而存天理”。惟“诚则明，明则久，久则是非判然矣”，^⑤ 诚就是要不断地进行自省，“审乎天理人欲之判”；^⑥ 诚就是要使“理存诸心”，“顺其理而不害”，则“巧伪之私无从而入焉。”^⑦ 郑真的理学思想虽无多少新意，但代表了明代早期浙东心学与理学趋于合流的潮流。

郑真家族自祖父郑芳叔、父亲郑觉民以来，一直是深宁派的传人。觉民与王应麟之孙宁孙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敦始终之谊，酒樽棋弈，论辩古今”，^⑧ 郑真视宁孙如季父，以子弟侍立，常得指点，其学问已深得宁孙的赏识。郑真少承家学，后又从学于程端礼，研穷六籍，尤长于《春秋》，博极古今。郑真曾辑《春秋集传》，收集了俞氏《春秋集传》、黄氏《日抄春秋》、沈氏《春秋比时》、刘敞《春秋权衡》、萧楚

①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7《乾坤一章亭记》。

②⑥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8《自省斋记》。

③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8《不貳庵记》。

④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9《东轩记》。

⑤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8《去非轩记》。

⑦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9《虚白轩记》、卷10《尚有斋记》。

⑧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42《王先生叔远行状》。

《春秋辨疑》等著作。

求我斋郑氏一门以“文献世其家”。^①在前辈学者和家学的影响下，郑真特别重视故家文献。他经常与缙绅一起讨论故家文献，并四处搜集，拥有“旧家文献三千卷”。^②郑真根据自己搜集所得，采录诸家格言，编为《集传》、《集说》、《集论》。郑真在元末采摭乡先生言行文辞，辑成《四明文献集》60卷。此书编成后从未刊刻过，在明代已经散佚。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邑人陈朝辅重赏从寒士刘让那里购得抄本，曾对王应麟一集加以补缀增益。今国家图书馆有清抄本《四明文献集》两册10卷，收董复礼等27人诗文小传，各家诗文后均有郑真按语，可窥原书之一斑。而王应麟集则从郑真原编中析出独行，亦称《四明文献集》，实是一人之作而冒总集之名。明代关于四明文章的辑录，最早的就是郑真的《四明文献集》，全祖望认为“其于乡先辈著述所存，甚为有功”。^③郑真为官安徽凤阳时，还曾参与了九郡图史的编修。^④

二、清俊雅音的诗歌

郑真现存的元亡之前所作的诗歌虽然不多，但很能看出他对于元王朝的态度。他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朔所作的《月食诗》云：“我年三十诚罕见，忧国忧家心恋恋。九重神圣正当阳，天象何为召斯变？举头问天天不言，人事祇今殊可怜。”毫无疑问，他对元王朝的命运是相当担忧的，举头问天而又茫然无措。他又有《送张郎中》诗云：“十年江海鸣征鼙，群黎惨淡愁疮痍。神功安用施刀圭，坐令寿域春熙熙。”他对元末动乱所造成的满目疮痍愁苦不堪，希望能有高人出来扶危定乱，还一个群黎熙熙的太平世界。

入明以来，郑真诗歌创作更为频繁，而仕途的沉浮左右着其复杂的心态，使他的诗作交响着明朗与阴郁的两重旋律。“好将盛事写丹青”，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重旋律。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钱塘“翰墨鼓勇登文场，嫦娥折赠一枝桂”，次年即以浙江省乡贡第一名的身份计偕上国。当时他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在京中“笑谈历历襟怀开，会聚

①③【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4《四明文献录题词》。

②【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89《庚辛岁闾斋春帖子》。

④【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10《安六斋记》。

风流那复易？”^①对仕宦有着很高的期待。他还不厌其烦地歌颂“圣主无为开泰治”，“雍熙正属唐尧世”，“已见神功回造化，还闻宽政蔼声歌”。来到京城，他毫不吝啬地赞美着皇都的盛世气象：“关河车骑三千里，京阙笙歌百万家”（《用韵与袁希曾》）。即使元宵观灯也透出皇家气派：“警传炮石边军肃，曲奏笙歌海若听。”他还从军事上渲染大明的赫赫声威，如《送胡万户》：“沧溟五月锦帆开，海上传呼将帅来。天近扶桑明白日，风行偃草散荒埃。”生活于这样一个盛世，他相信“当世正须文与武”，统治者正需要大力网罗人才，儒生们“明时有待调羹用，勋业终看上九霄”（《送王运同》），等待着实现自身的抱负。这时他真诚地歌唱皇恩浩荡，字里行间跳跃着欢乐的音符：“山深兴逐云霞远，天润恩承雨露多。尚使斯民跻泰域，未应吾道变颓波。百年且向东风里，酹酒当筵舞太阿。”（《用韵答彦彬》）他相信实践“吾道”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不禁迎着东风舞之蹈之。在《用韵复阎至明》一诗中，他甚至以董仲舒对策自比：

风外游丝着面轻，困人天气半阴晴。

董生早受春秋学，许劭新推月旦评。

闾闾日高天宇阔，蓬莱山近水云明。

看花看柳青春好，莫负东君万古情。

他感受到伟大时代的东风扑面而来，看花看柳，青春总好，不禁为之陶醉，决心用自己的所学，报答东君的厚恩。他从心底里喊出了“莫负东君万古情”、“报国好酬千里力”的口号，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压抑的士人从心底里爆发的激情。

然而好景不长，洪武六年（1373年）郑真被任命为安徽凤阳府（即濠梁）临淮县教谕，这根本就出乎他的意外，他的政治期待完全落空了。原来郑真对自己的学问非常自负，在政治上期待很高，盼望着“君恩天上怜才俊”（《题梅花》）。他在淮山有做梦诗写道：“华发相将五十年，飘飘剑佩向淮天。床头一卷春秋学，梦里犹闻殿下宣。”他渴望着随时被宣召，幻想着经历“锦床绣褥亲王座，听说遗经二百年”、“香粳软饭传恩赐，饱德讴歌既醉篇”的隆遇，幻想着成为“矫首金门献赋人”而受到朝廷的赏识。在《用韵答夏威原绝句》组诗中，他毫不隐晦地倾诉着自己的满腔心事。他说：“湖海不知台阁事，升平草颂

①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96《再咏看芙蓉答沈文举》。

岂无人”、“谩道翰林华盖逼，手裁春帖是何人”，他之所以这样臆想，无非是自视有翰林之才，以能进入翰林院为人生最高理想。谁知朝廷却命他掌教淮山，在纷纷“流俗相嗤黠”中，他产生了“空作乡闾第一人”的失落感。而当时的凤阳府“洊罹兵燹，草莱新复，以耕牧樵采为事，四方谪取者，甘心商贾，视简册为何物”，^①一想到濠梁是明代士人流放的集中地，又是文化沙漠地带，他的心理便严重失衡。他甚至觉得自己跟“迁谪”没有什么两样，^②自觉“心中磊砢不能浇”（《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写怀》），一度激发起来的高昂情绪猛跌下来。因此他客居凤阳时所作的诗歌，一方面心存魏阙，另一方面又充满深深的悲慨。这只要看一看《八月中秋日宿郑文中家是夜月食随班行礼次日玩月慨然有怀作古诗一首》中的情绪变化就可测知大概了：“郡府工歌听苹鹿，春日计偕登上国。翩然捧檄濠梁来，苜蓿盘空照晴旭。凄凉逆旅逢今宵，何用沽酒倾金瓢？”虽然郑真在濠梁时期的诗歌也不时响起对王朝的颂歌，但魏阙既不可望，于是怀乡思亲之情遂逐渐跃升为主旋律，他的笔端缠绕着化不开的乡情、亲情和友情的“情结”，而推移的时间更将乡愁熬浓，即其所谓“五十年过犹作客，二千里远只思家”（《辛酉岁春帖子》）是也。当然，他的乡恋情结并不是单纯的，还纠结着归隐林泉的意愿，即所谓“三年远作淮山客，只欲归来把钓竿”（《秋江独钓图》）。“情结”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荣格认为“大部分是创伤、家庭互动与模式、文化制约等经验的产物。”^③确实，情结的生成与个人遭遇、家庭、社会环境，甚至文化传统都有关联。郑真的乡恋情结则与为官在外的遭遇有直接关系，也与特定的地理、文化环境下所积淀的集体无意识有关。浙东山海阻隔的地理环境，小农经济的生活方法，决定了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有一种深沉的依恋。古人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④正是这种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而士不相遇的苦闷，与游子羁旅的凄凉落寞纠缠在一起，更易于诱发乡土之思。故士人每当背井离乡、仕途蹭蹬之时，就会表现出宗法制人伦关系特有的思乡念土、怀旧恋故的游子情怀。这在郑真身上表现得

①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47《吴先生传》。

②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53《东园庄赋》。

③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译：《荣格心灵地图》，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63页。

④ 《汉书·元帝纪》。

尤为强烈。

情结属于个人的潜意识结构，泛指一个人在心灵深处对某种东西的迷醉或依赖。情结的基础结构“是由带有强烈情感的某种心灵情境所呈现出来的意象”，^① 情结是内在心灵的本质，而意象则是探究情结的钥匙。郑真诗歌中的思乡意象即为其乡恋情结之所寄。他虽然离开了家园，但是他的心仍然留在故乡。远在万里之外的故乡，虽然造成现实上难以跨越的空间距离，但却无法阻隔诗人的思绪回到远方的故乡。而由于空间距离可藉由心灵的活动瞬间泯除，故而诗人以当下所处的环境出发，心灵的活动在时与空、过去和现在、异域和故乡之间反复交错、循环往复，形成一种牢不可解的情意纠结。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挚爱怀念，成为濠梁时期诗歌的主旋律。他说：“夫爱发乎情，根乎性，触物而动，有爱焉，弗爱焉，爱而得其正，斯知所爱焉。”^② 如此，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挚爱也染上了浓郁的儒家伦理情感的色彩。

郑真远离了政治中心之后，强化了他的边缘化角色。理想的黯然消失，使得世俗的琐碎生活有可能升值，于是他的诗歌开始超越文人登临山水、玩索书画的高雅圈子，务实地关注起了浑浑噩噩的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如《十一月初九日早出南门》云：“狐皮为帽裹头颅，造化春融病骨疏。濠上独行霜雪晓，旁人认得老髯苏。”他所素描的自我形象，已经俗化为一个病态的底层人物了，只有从“旁人”的指认中还仅存一点聊以自慰的文人影子。《人有为石梁谣者录成十四首》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他写到了居住环境和以马、牛粪作燃料：

土塹为家似燕巢，秋来风雨怕潇潇。

马通拾得团成饼，晒向墙头待暮烧。

土坑边头半镬汤，晓寒睡起怯衣裳。

女郎烧火添牛粪，笑指灰中饼饵香。

你看，砌成土塹的家似燕巢一般，墙头晒满团成饼状的马粪，而这些马粪又都是从路上捡来的。早晨从土坑中睡起，身上感到有几分寒冷。女郎烧火，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中国的古典诗歌意象中，女郎向来与牛粪之类不沾边，郑真却推出了“女郎烧火添牛粪”的特写镜头，

^①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译：《荣格心灵地图》，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62页。

^② 【明】郑真：《荜阳外史集》卷48《爱日堂铭》。

还要让女郎开玩笑：团成饼状的牛粪燃烧起来发出的特殊气味，闻起来真的似饼饵之香。这传神的一笔，仿佛是贫穷中人在饥肠辘辘中生发而出的精神会餐，而女郎一“笑”，则使贫穷之家升腾起乐观的生活氛围。再如：“养得儿男学务农，布衣褴褛髮蓬松。兔园亦有村夫子，夜雨残灯教过冬。”素描出了乡村教师真实的生存境况。郑真不但不避俗事、俗物（有的历来是诗词家所不屑注目的事物），而且还写出了世俗的愿望：

斤斧山中日日操，求生莫问此生劳。

草柴卖得钱三百，不怕城头米价高。

少妇新缝八塔鞋，可怜两足带尘埃。

盆中有水不须濯，却待人间好日来。

樵夫总渴望自己的草柴能卖个好价钱，以便换取更多的粮食；少妇总盼望着“人间好日”快点来临。他们的生活愿望并不高，但米价常高，好日未来，穷冬腊月，难遮霜雪，不高的生活愿望往往成为一种“奢望”，于是有了樵夫的“求生莫问此生劳”，于是有了妾身的“夜灯明灭泪成行”。

对于底层社会的风俗，郑真也有触及：

义勇祠前酒似池，鼓笳吹动赫人威。

满身插得真刀剑，要与皇家作健儿。

婚娶家家礼俗谙，东邻少妇嫁童男。

园篱缚架开筵宴，借得船头一片帆。

总之，郑真的这组诗化雅为俗，以俗为美，他聚焦于太平常的凡俗人生，以似俚似谣的腔调，书写出了世俗社会的生存状态。它消融了文人的价值，而以世俗的真实取胜，用语浅显，不事雕饰。

沉浮于底层的生活，使郑真更加看清了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有《和王子璋见贻》诗云：“海上人家叹庾廖，海边山壑遍藏尸。糠粃岂可供常爨，饘粥胡能疗积饥？”自注：“是岁饥，饿莩甚众。”这个时候，他的仁政理想已经接近于破灭了。

郑真的心灵深处一直盘踞着仕与隐的两大情结。一方面他看到“明廷正招贤”，山林之士有望入仕；另一方面有感于朝廷对人才的摧残，不断地抒发对山林归隐的向往。郑真晚年到了广信府，有很多诗歌题咏枯木图，内容多是对人才老而未用深表惋惜。这也可算是他对于自己政



治失意的最后总结了。

郑真的诗歌除了反映他的心路历程外，还有很多是传道之作。如他所题咏的历史画，借题发挥，与咏史诗并无多大区别，但议论一旦涉及妇女，见解就显得迂腐保守。如《题苏武握节图》：“啮雪餐毡使节孤，老来不肯困穷途。如何娶妇为姬妾，教得生儿也姓苏？”他指责苏武在性欲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气节。比较苏轼在《东坡志林》卷1所云：“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苏轼在苏武性欲问题上的看法就要通达多了。郑真又有《题蔡琰归汉图》云：“玉颜没入左贤王，万里天高恨雪霜。名父不应儿失节，九泉羞杀蔡中郎。”这里则是教训名士蔡邕养女失节。《题二乔观书图》云：“粉袖春纤露笋芽，瑶编舒卷向窗纱。古来女宠存龟鉴，国色娉婷莫自珍。”“云锦衣裳玉雪肤，君臣共喜得双姝。不如诸葛粗粗妇，手挈练裳过草庐。”这两首诗从骨子里说是宣扬女色祸水论。显然，郑真从历史情感中显示出来的妇女观是相当落后的。

在明初四明的越派作家中，郑真的诗歌不仅内容较为充实，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有一些特色。陈田《明诗纪事》卷28曾评论说：“荥阳外史邃于经学，诗亦清俊，不愧雅音。”总的说来，郑真诗自然清俊，多存雅韵，虽无大成，亦有小巧。尤其是他的乡恋诗和题画诗，在艺术上有较多的可取之处。

郑真的乡恋诗数量不少，其情不外乎“触物而动”，而遥不可及的故乡，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状态，均化为具体真切的可视性描写，其在表现手法上较有特点的可归为以下三类：

一是进入审美回忆。故乡是自己的生命之所出。故乡之可恋可感，不仅因为那是诗人所成长的地方，更是与诗人的血脉亲情相连之地。在诗人的生命历程中，故乡的亲朋好友、故乡的景物，无一不与诗人发生密切的关系。想念家乡自然会联想到有关家乡的一切人与事物，尤其是与诗人生命血缘息息相关的亲族。追忆故乡的亲友、妻儿、水泉、草木，无疑是诗人精神上的寄托。诗人被强劲的内心情感所驱动，情感推动他的回忆“探测器”，可使记忆深处的各种表象接连不断地浮上心



头。如《题观泉图》云：“我家四明山谷间，清溪碧涧流潺潺。石床侧目试一听，恍如仙子鸣瑶环。山中夜来新雨足，更上重峦看晴瀑。银河千尺欲飞翻，万鼓雷鸣荡坤轴。汪然下注川渌深，清光一镜明吾心。洗净尘氛百千斛，多情便欲投吾簪。”通过观泉图，触发了作者的审美记忆，于是记忆深处四明山观泉听泉的表象便再现了出来。表象作为曾经被感知过的事物在脑中再现出来的形象，往往具有某种想象和联想性，并通过相关联的物象连接昔今的时空。郑真《题梅花图》写道：“我昔达蓬山下住，绕屋梅花千万树。瀛洲仙子日相招，百折衣裙翻缟素。近年为客准上山，老来霜雪怜形颜。要与花神同一笑，重重岩壑劳跻攀。”还有种芭蕉诗写道：“故园曾忆种芭蕉，长日熏风一扇摇。爱向淮南分别种，夜深凉雨听潇潇。”这里，审美回忆照亮了记忆幽深的“库藏”，使经验碎片敞亮并形成有意味的形式，并与现实经验相对照，在不同时空的组接中，呈现与“我”的悲喜紧紧相连的跌宕起伏。

二是达致审美幻觉。审美回忆虽然也具有某种虚幻性，但它毕竟是过去的生活实践中的印迹在头脑中的重新呈现，而审美幻觉则纯粹是主观想象的产物，是诗人按照自己的理想把记忆残片编织而成的美妙意象。乡土故园之思是珍藏于胸中的一片风景，梦魂牵萦中激发想象活动联翩展开，作者又极力将之幻觉化，以此来代替现实的苦闷。如《谢丁相公惠牡丹》：“几年作客向蓬莱，一捻胭脂笑口开。想见故园春满眼，浓妆淡抹待归来。”面对小小的牡丹花，强烈的思乡情感引爆了诗人的审美幻觉，这种艺术幻觉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正常的安慰。在他的笔下，故乡的风物都翘首相待，其情依依，那里有“江花江草解怜人”（《题便面》），那里有“白云翘首海瀛东”（《题秋山图送梁先生》），那里有“黄鸟啼春尽日酣”（《题便面赠叶子中先生归慈溪》），使我不禁生出了“人生只合住江南”的深沉感叹。于是他在欣赏《梅花图》时，那白梅更化为山中佳人问他归时，随即出现了如下幻景：“山中佳人白玉肌，岁寒问我何当归？要把长琴作三弄，梦里魂随双鹤飞。”在这里，客观实在的图画已经被情感幻觉化了，而审美心像幻化回旋的结果又进一步增加了情感的强度，所谓“有约玉人终不到”（《题梅花》），使他有辜负梅花老岁华的深深遗憾。他还总是想象瀛洲碧海仙人往来，召唤着他的归来。这种融入虚无的审美情感体验，更多地体现了古代士人的生存智慧。